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许冰彬

内容提要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关键词　明代　宦官　内操　兴衰　特点

宦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与宫廷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宫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1]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的军事体育娱乐活动服务，史称“内操”。内操是明代宦官所独有的特点，梳理其兴衰历程，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及历史影响，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大有裨益。目前学界对明代内操的研究文章主要有秦贤宝《明代的内操》[2]、王春瑜和杜婉言《明朝宦官》[3]一书相关章节等，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明代内操的兴衰及阶段性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　何谓宦官内操

明代有不少宦官习武。郑和就是一位参加过“靖难”之役的习武宦官，后来成为远航西洋庞大舰

‹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明代宦官》，页807，中华书局，1984年。

‹2›　秦贤宝：《明代的内操》，《紫禁城》1991年第5期。此文主要梳理了嘉靖至崇祯内操的概况，并分析了内操起延的原因及影响，但是对明穆宗时的内操情况以及内操的阶段性特点涉及不多。

‹3›　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页116，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此书在宦官对军事的影响一部分里提到了内操，因为不是专门论述，故颇为简略。

书籍1.indb 29　12-2-7 下午1:13

队的统帅；明英宗北京保卫战时期曾一度出现了数百骑报效争功的宦官，然而没有更多史料证据表明这批宦官曾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还没出战便自乱阵脚。真正有组织的宦官内操是在明武宗时期，伴随边军入操大内的历史机遇而发端，好武的正德皇帝正是促成宦官内操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

“内操”一词首次出现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王良佐等就选各营卫官军操练一事的奏折上，其中提到“内操西官厅六千六百四十二人”[1]，不过这六千余人显然并非宦官。西官厅原本是为宣府、大同边患而建的“操练申令之所”[2]，后来成为正德皇帝好武逞勇，比之团营的内教场[3]。正德十一年(1516)，随着边军入操大内，明武宗也训练了一支由宦官组成的军队，这是一支由宦官统领、宦官组成，皇帝直接指挥的“天子亲军”，宦官内操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明武宗常率众宦官于内校场驰骋操演，此后“内操”一词语义便有所缩小，专指宦官的军事训练。其主要特征如下：

1. 人员构成。内操宦官约三千人左右，或起源于正德时三千京军、边军互调操练之事，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京师沦陷[4]。据内教场碑文，内操选精健太监三千人，中军以总牌领之，另设有明甲、硬弓、随伍等官[5]。据《玉镜新谭》记载：“祖宗朝不闻有内操之制，忠贤外胁臣民，内逼宫闱，简选精兵，训练大内。操刀劫刃，炮石雷击，金鼓震天，旌旗蔽日。中列大珰，蟒衣玉带，壮士百人，悬牙牌，衣绯襟侍卫于前。外绕雄兵，勇巾利刃， 貔貅千骑，披锦泥，垂绣辔，围匝于后。”[6]可见，魏忠贤时内操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大珰，即首领太监，这里或指魏忠贤；侍卫壮士，从“悬牙牌，衣绯襟”[7]的装束可知亦是太监；外围“雄兵”语焉未详，可能是招募的普通军士，也可能是对内操三千太监的溢美之词。

2. 内操服饰。武宗时，内操诸军悉衣黄罘甲，以至于成为中外时尚，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市井百姓都身披黄罘甲。而遮阳帽上则以飘靛染天鹅翎为贵，最贵者三英、次者二英。时任兵部尚书

‹1› 《明武宗实录》卷一二六，正德十年(1515)六月甲戌，页2526－252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1962年(下文凡引用《明实录》处，不再一一注明)。

‹2› 《明武宗实录》卷一〇一，正德八年(1513)六月壬寅，“英国公张懋奏，奋武营将台迤西空地，乞造官厅为操练申令之所，命工部阅视，覆请，从之。时宣大边报急，懋奉旨会太监萧敬阅军，故为此请，后名西官厅云”。页2093。

‹3› (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初好武，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比之团营，后江彬、许泰皆以边将得幸入豹房，乃立内教场，别为都署”。页16，收于《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神州国光社，1947年。

‹4›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贼长驱犯阙，守陴者仅内操之三千人，京师遂陷”。页2183，中华书局，1974年(下文凡引用《明史》处，不再一一注明)。

‹5› (清)于敏中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禁旅之设，遴拔监、局、诸司内员精健者三千人，统以总提分治，以中军领以总牌，次设明甲、硬弓、随伍等官”，页654，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6› (明)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五《内操》，页33－64，中华书局，1989年。

‹7›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九《内臣服佩纪略》，页166－167，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书籍1.indb 30 12-2-7 下午1:13

王琼得赐一英冠下教场，自谓殊遇，于是披黄罘甲、顶飘靛翎冠，竟然杂处于内操宦官之中。除了黄罘甲、靛翎冠之外，可能还有一种红袍襒，即前文提到的“绯襒”。韩邦靖有一首诗写到武宗内操情况时说：“鸾驾常操内教场，何曾汤火试红妆。”[1]这里的“红妆”并非指宫女，而是身着“绯襒”的宦官，意指内操兵从未经过真正的军事考验。明末周同谷有诗曰：“天子宫中肄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2]诗中的“红妆小队”同样指宦官。而负责内操的宦官首领则身穿官服，蟒衣玉带，以示恩宠。

3. 内操场地。内操均在皇城内教场举行，名称、地点各有所变迁。武宗时内教场设于豹房附近，后来主要设在北海五龙亭西北一带，至今还保留校场胡同的地名。《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内教场今名教军场，在今弘仁寺东北，其地有三圣祠，祠内有碑，略云：‘教场内三圣祠，以祠火神、水草神、马帅……于大内西北二处分场训练，后皆并练于此。’”[3]嘉靖三十年(1551)，明世宗更定营制，内教场一度更名曰内戈用营，但后世不复用之。据《酌中志》可知，内教场有振武殿、恒裕仓、省敛亭等建筑[4]。蒋德璟在《游宫市小记》一文中也说到：“循海北而西为雷霆洪应之殿，以东为内教场，又东为五龙亭。”[5]又《天启宫词》：“梳妆墮前北台坡，校地平光好试戈。貂珥军容天宝并，不推神臂擅宜和。”诗后作者自注：“内教场在萧后梳妆台之东，北台之西。北台，即乾德殿是也。”[6]乾德殿在五龙亭北，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有如城阙龙宫，俗称北台[7]。崇祯皇帝时又在万岁山后开辟了内操场地，并修建了寿皇亭，以备阅视[8]。

4. 训练内容。主要以队列、骑射、火炮、火铳等火器为主。凡举内操之地，鼓炮之声震骇城市。明代宦官掌管的八局之一兵仗局，设有军器库提督一员掌关防，设有监工数十员专门负责制造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种兵器，另有火药局一处附属机构。魏忠贤时，凡解宁远、皮岛等处佛郎机火炮等重型武器，也多在兵仗局库中[9]，内操之时每试红衣大炮，宫阙悉为震动[10]。宦官掌

‹1› （明）韩邦靖：《长安宫女行》，收录于《列朝诗集》丙集第十六，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32册，页4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明）周同谷：《霜猿集》，收录于《丛书集成初编》页2，商务印书馆，1937年。

‹3› 前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页654。

‹4› 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页141。

‹5› （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五九，页3695，中华书局，1987年。

‹6› （明）蒋之翘：《天启宫词》，收录于《明宫词》页4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页140。

‹8›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甲申之变》，“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页1382，中华书局，1977年。

‹9› 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页110－111。

‹10› 前揭蒋之翘：《天启宫词》，页44。

书籍1.indb 31 12-2-7 下午1:13

管武器的制造与贮存，为内操训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　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

据秦贤宝先生研究，“至少在正统时期，宦官已开始在宫中有组织地武装训练了，也就是说，内操至迟于明英宗前期曾经举行”。然而北京保卫战时出现的宦官骑兵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些宦官是否经过正规武装训练也不得而知，或许不能作为内操出现的依据，明英宗时期的史料对此也只字未提。因而，明代内操的发端还是定于武宗正德时期较妥一些。

（一）正德时期

明武宗本身好武，不喜宫禁束缚，常在西内豹房骑射游乐以及处理政务。正德七年(1512)五月十八日，吏部尚书杨一清等人就明武宗大内练兵一事上书，“龙舆常幸豹房驻宿，累日后苑练训兵戎，鼓炮之声震骇城市，以宗庙社稷之身而不自慎惜，此群臣所以夙夜不能安也”[1]。武宗置若罔闻。其时，身在京城的边将江彬因遭钱宁猜忌，欲籍边兵自固，便投武宗所好，盛赞边军勇猛骁悍远胜京军，以求互调操练。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十七日，明武宗不顾兵部反对，下旨令京营、宣府官军各调拨三千人互换操练，“宣府调三千人，限十日至京，京营赴宣府备御者亦如其数，每年春秋更替，人赏银一两”[2]。大学士李东阳等人就边军入京操练一事力谏“十不便”，武宗不予采纳，于是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马入京团操于大内，号为“外四家”。“外四家”由江彬统领，每操练之时，“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3]。明武宗宠幸边将，调动边军入操大内，这也使得宦官的内操出现了可能。“外四家”虽然入操大内，但毕竟是春秋更替的边军，明武宗需要的是一支绝对忠诚的“天子亲军”以便亲自指挥操练，于是宦官的内操便借机出现了。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二十一日，“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耀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曰：‘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罘甲，中外化之，虽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细民亦皆披化之，及周等遮阳帽上飘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焉。其后巡狩所经虽督饷侍郎、巡抚、都御史无不衣罘甲见上者”[4]。这是明代宦官内操首次引起世人注意并形成初步规模的明确记载。

‹1› 《明武宗实录》卷八七，正德七年(1512)五月辛酉，页1859。

‹2› 《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丁亥，页1995。

‹3› 《明史》卷三〇七《江彬传》，页7886。

‹4› 《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四，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壬申，页2663－2664。

书籍1.indb 32　12-2-7 下午1:13

据李洵先生研究，豹房权力是由皇帝、宦官、边帅和依附贵族的朝臣等几股政治势力构成的，以张永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尽管有所削弱，但始终是豹房政治中的主要角色[1]。明武宗开创的内操更是离不开宦官。武宗于端午节射柳之日，曾令内操众太监分为两营，一为唐营，由一强健太监扮作“小秦王”李世民；一为高丽营，由一太监扮夷将“莫离支”盖苏文。“小秦王”须率领一批“唐兵”攻破“莫离支”阵营，如果失败要受军令责罚，胜利则会加官封赏蟒玉。有一个叫于喜的豹房太监便借此机会获得了武宗的宠信[2]。可见，这是一种军事竞技游戏，完全是武宗的宫廷娱乐。

（二）嘉靖时期

明武宗死后，大学士杨廷和代拟遗诏遣还边军，罢威武团练营，随将设计擒获并处死江彬，武宗亲手创立的“中军”也被解散，喧嚣一时的内操也随之消失。新君嘉靖皇帝朱厚熜以藩王入承大统，鉴于武宗时期太监之祸，对宦官的控制比较严厉，因而整个嘉靖时期也没有出现有名的权阉。嘉靖元年(1522)，曾经风光无限的内教场房屋损坏，一片荒凉，内官监奏请修理，户部认为财力匮乏，不宜整修，明世宗表示同意，并且告诫内监“无得生事害人”[3]。

然而“壬寅宫变”之后，明世宗一直躲在西苑炼丹修仙，二十余年不回大内，朝政败坏，军备废弛，“南倭北虏”之患不断。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进犯京郊，直逼都门，京营中军队不到五六万人，士气低落，无人敢上前迎战，任其劫掠而去。世宗大怒，处死兵部尚书丁汝夔，决心改革兵制，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又听从仇鸾建议，“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分番入卫，与京军杂练”[4]。既便如此，世宗似乎仍不放心，又决定重开内教场，操练宦官，“昨岁(即嘉靖三十年，1551)上既更定营制，命改旧内教场名曰内戈用营，欲以团掺内使。谕所司建一祀所，并营舍数间，中立一台，备御视”[5]。自此，消失了三十余年的内操又出现了，修葺一新的内戈用营再次迎来宦官组成的“天子亲军”。不过，明世宗醉心于西苑修道练丹，很少见到他阅视内操的记载。

‹1› 李洵：《正德皇帝大传》页9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二中贵命相》，“(端午)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败者行军令，能人者与蟒玉。诸内侍雄健者，策马以往，屡冲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长大，或可任此。’上回顾领之，畀擐甲胄，带假髯，作小秦王装束，仪形颇伟岸可观，甚惬上意，命以所御龙驹借之。喜据鞍挥策，马顾见喜状，素所不习，大惊狂骛，直突莫离支中军，各营披靡解散。天颜大怡，即赏蟒玉如约”。页165，中华书局，1997年。

‹3›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元年(1522)四月甲辰，“内官监奏，内教场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轩损坏，乞加修理。部议以财匮民贫，宜暂停止。上曰：然。各处地方艰难，军民困苦，财力匮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无得生事害人”。页468－469。

‹4›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页2181。

‹5›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二，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己巳，页6762。

书籍1.indb 33 12-2-7 下午1:13

（三）隆庆时期

穆宗在位时间不长，借大阅之机进行内操，实际上“好观武事”的因素更多一些，因而也具有习武游乐的性质。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初穆宗好观武事，时江陵为末相，遂于条陈疏中特列一款曰实武备，请上每秋大阅，躬诣校肄，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内教场习射等事起矣。”[1]“好观武事”的穆宗对内操同样很有兴趣。《嘉靖以来首辅传》中提到：“（穆宗）俄复命修内教场，勒中贵人习骑射。（徐）阶因御史言复率同官上疏谓：‘陛下此举盖因边方多事，居安虑危，故示边臣，以意使之振戎饬武耳，如御史言则有防微杜渐之虑。臣等窃谓边方远，禁地近，圣躬重戎务轻，当先帝时尝欲立二内营而复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报寝。”[2]可见，穆宗尚能接受群臣谏言，内操一事很快停止。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嘉靖皇帝也曾有“立二内营”的考虑。

（四）万历时期

明神宗幼年即位，一直处在首辅张居正的阴影之下。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神宗开始亲政，乾纲独断，次年便选宦官进行内操，以便谒陵时“军容扈从”[3]。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神宗亲选内竖二千人，令太仆寺配给三千马匹，时任兵部尚书张学颜拒不给马，又奏请停内操，神宗不纳[4]。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又“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5]。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即万历十二年，1584）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群，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赉二万余金。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珰，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暍死者数人。”[6]由此看来，内操的宦官除了充任谒陵时的护军以外，还用来端午节骑射表演，再现了武宗时“过锦”的壮观景象。神宗对他们的训练要求甚为严格，以至于数人中暑而死，因而在某些方面胜过京营也不足为怪了。

端午过后一个多月，六月二十八日南京福建道试御史谭希思上疏请停内操，“选兵操演内廷”有违祖制，神宗大怒道：“内臣及内操俱系先朝建置，为奉慈驾春秋二祀山陵及朕恭祀南北郊护从，已各有旨，谭希思沽名建白，南京都察院其究问以闻。”[7]谭希思抬出太祖祖制，神宗也抬出武宗祖

‹1› 前揭《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穆宗仁俭》，页792。

‹2› （明）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收录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52册，页49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二《端阳》，“今上因癸未（万历十一年，1583）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页68。

‹4›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页5856。

‹5› 《明史》卷二三四《董基传》，页6093。

‹6›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二《端阳》，页67－68。

‹7›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〇，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癸酉，页2794。

书籍1.indb 34 12-2-7 下午1:13

制，君臣各有所依。或许是意识到宦官们的骄纵跋扈，九月十四日谒陵前一天，神宗特意下旨“司礼监传谕总督内教场管事高相等，朕奉两宫圣母恭诣天寿山行秋祭礼，尔等率领中军等官并各队人等俱小心严肃，各守信地护卫，毋喧嚷错乱”[1]。没想到第二天行至凉水河时，“忽有惊马冲入扈从前队，群马一时狂奔，内兵跌伤人众”[2]，时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则借机上疏：“内操随驾军士，进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争无纪律，奔逸冲突，上动天颜。”[3]神宗以为此属偶然事件，不再问责。

按旧制，随驾祭祀的营军从内库领取衣甲、武器，事毕俱要归还，而内操宦官以“天子亲军”的名义拒不解散，披甲怀刃，出入宫苑，无人敢问。群臣纷纷上疏请止内操，却被神宗一一责罚。仅万历十二年(1584)就借此处罚了大批官员：刑部主事董基，谪万全都司都事[4]；南京等科给事中孙世祯等请止内操，夺为首者俸一年，余各五月。南京等道御史田一麟等，夺俸[5]；南京御史郭惟贤，革职[6]；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江西等道御史潘惟岳等，夺为首俸六月，其余三月[7]；山东巡按吴定改变策略，言辞委婉，请内兵发京营操练，神宗责其不谙事体，仍夺俸五月[8]。

群臣劝谏毫无效果，新就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只得出面游说司礼监：“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 。”[9]如果皇帝在内操中遭遇不测，宦官们也必自身难保，这一番危言耸听的说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官悚然”，自请停止内操，神宗见宦官也反对，便有废止之意。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六日，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又上疏谏止内操，神宗留中不发，敕谕内阁：“内操原有，祖制向缘扈从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事毕而止，殆无常操之理，而言者不知，妄引非喻，亦是其职，今已停止，卿等知之。”[10]在这份敕谕中，明神宗首先借“祖制”为自己重开内操进行辩解，然后明确表示顺应群臣所请，即日停止内操。自此，万历年间再未举行，内教场亦逐渐被人们遗忘，到万历后期“内教场已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11]。

‹1›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三，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丁亥，页2836。

‹2›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三，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戊子，页2837。

‹3›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页5856。

‹4› 《明史》卷二三四《董基传》，页6094。

‹5›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〇，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甲子，页2787。

‹6›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〇，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庚午，页2791－2792。

‹7›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三，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庚子，页2840。

‹8›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六，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乙卯，页2882。

‹9› 《明史》卷二三四《董基传》，页6094。

‹10›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九，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丁丑，页2918。

‹11›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二《端阳》，页68。

书籍1.indb 35 12-2-7 下午1:13

万历时期的内操自开始至罢停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其后续影响一直长期存在。贪财好货的明神宗首先从这里面发现了生财之道。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二十四日，户部上疏“太仓银库每岁加金花银二十万两，内操马三千匹，岁加刍料银七万余两，此皆额外之数。岁可三十万，十岁则三百万矣，请金花之银仍复旧额，内操之马散归京营，上未之许也”[1]。万历皇帝停内操，却不许内操马匹散归京营，并以此为借口多征银两。时任户部尚书王遴无奈之下只能往各省摊派。同年六月初二，户部以内操马匹刍料银一万四千余两增派山东缴纳，时正值山东大旱，抚臣李辅上疏指责王遴助天为虐，王遴两边为难，只得酌情减去七千八百余两[2]。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十六日，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疏奏：“内操用马遂以加派省直赋额，今也内操罢矣，该监之马所存无几矣，其价银除裁减外，所征尚五万七千余两，纵有贡马等项，所费几何？而执三千之虚名，糜三千之实费，将焉用之？此价银之议，罢所当从也。”[3]明神宗见疏大怒，以“掇拾余言，沽名渎奏”为由将其夺俸一年，又告诫言官不得讪君卖直。御马监仓场原额每年四万七千石，三场草共一百七十四万束，自万历十三年增添内操马三千匹，岁增料二万五千石，草六十万束，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初九，户部题请酌议裁减草料、清查马匹，无使虚冒，神宗一概不允[4]。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等奏称“内操暂增停罢之后，马数虽减而所派草料比原额更多，亟请清查着为定制……疏入不报”[5]。可见，内操虽停，却阴魂不散，明神宗一直借其虚冒马匹等草料银，堂堂一国皇帝竟然也要吃空饷来敛财，可见其朝政荒谬透顶。《明史》提到万历宫廷财政时说：“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余两。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6]

除了宫廷财政方面的因素之外，也有政治上的原因。神宗中后期因立太子争国本事件与文官集团极度对立，从而深居内廷，消极怠工，长达几十年不上朝，神宗故意虚冒内操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朝臣长期对抗的紧张关系。

（五）天启时期

明熹宗在位时，出现了明代最有名的权阉“九千岁”魏忠贤。天启元年(1622)，目不识丁的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为巩固地位，对抗朝臣，“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淮为援。

---

1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〇，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乙丑，页2937。

2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二，万历十三年(1585)六月辛丑，“户部以内操马匹增派山东刍料银一万四千两有奇。时东省方旱，抚臣李辅疏争之，诋尚书遴助天为虐，遴不得已，就派征数内减其七千八百两有奇，俟马归囿寺仍复原额。从之”。页2958。

3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三，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庚辰，页3178。

4 《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二，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辛酉，页4852－4853。

5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九，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乙亥朔，页5151。

6 《明史》卷七九《食货三·漕运仓库》，页1928。

书籍1.indb 36 12-2-7 下午1:13

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1]。魏忠贤开设内操可以说与佞臣沈淮的诱导密不可分。沈淮曾为内书堂教习，也算是魏忠贤、刘朝等人的老师，魏忠贤得势，沈淮也由南京礼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沈淮籍内监刘荣得通于魏忠贤，内操之议，皆自沈淮导之。”又“使其门客晏日华潜入大内，诱刘朝等练兵，顿使圣明之朝，再见江彬之事”[2]。尽管群臣力谏止内操，但熹宗宠幸宦官，以“祖宗故事”为由不纳。天启三年(1624)秋，“忠贤益无忌，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3]。明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中也有很多关于内操的描述[4]，如：

十二龙旗大阅翻，冠军更识圣人尊。九边羽檄防秋急，只在亲劳细柳屯。自注：阁臣沈淮请复内操，为忠贤内镇守之基。

绣桷金铺天上头，飒然笳鼓似边州。观兵岂为夸雄武，一净辽云万里秋。自注：忠贤导上以武，每月总恿操内兵，赏赉甚渥。

掖庭底事见兵符，介胄威严可有须。闯地殷訇雷炮激，高张毳幕演平吴。自注：每操试红衣大炮，宫阙悉为震动。

另有沈德符《天启宫词》[5]：二广双甄库脚牢，御营日丽战云高。封章台琐俱休进，万乘临戎正内操。

明末诗人尤展成，晚年以博学宏词入史馆，曾仿李西涯体作《明史乐府》百篇，其中有一篇《赵高传》影射魏忠贤，说到“内操挝鼓鸣刀弓，犴狴流血朝班空”[6]。

随着魏忠贤的权势日增，内操的声势亦日益浩大。这支宦官组成的队伍在宫禁之内操练，鼓炮之声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甚至将一位刚出生的皇子震死；还有一次太监王进在熹宗面前试用枪铳，不慎炸到自己的手，几乎伤及天启皇帝朱由校[7]。外廷正直的臣僚们皆惶恐不安，弹劾魏忠贤、罢请内操的奏章不断呈上御前。史上著名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内操即是其一[8]。但是熹宗醉心于油漆木工、水傀儡戏，无暇理会这些奏章。魏忠贤气焰亦更加嚣张，对这

‹1› 《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页7817。另见《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二年)是春举内操。”页300。

‹2› 前揭《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页1135。

‹3› 《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页7818。

‹4› 前揭蒋之翘：《天启宫词》页44。

‹5› (明)沈德符：《清权堂集》卷四《天启宫词十首》，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7册，页5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 (清)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明史乐府》，页446－447，中华书局，1982年。

‹7› 前揭(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页1136－1137。

‹8›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页6327。

书籍1.indb 37 12-2-7 下午1:13

些大臣纷纷打击报复，甚至置于死地，连皇帝的冯贵人也因劝罢内操，竟被客氏、魏忠贤矫旨责为诽谤，从而赐死[1]。据《玉镜新谭》载："忠贤拥上南面窥阅，口吐机锋，至尊垂察其筹画，手持令帜，三军悉受其指麾。是以龙蛇竞走于九斿之端，燕雀高飞于五云之外。人心同而政教行，鼓声进而金钲退也。此忠贤擅违祖制，以设伏内应之逆迹也。"[2]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效忠于魏忠贤的军队，魏忠贤凭借炙手可热的权势大举内操，逐渐培植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六）崇祯时期

崇祯皇帝即位时，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已到了濒临灭亡的境地。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即位不久便诛除魏忠贤及其党羽，裁撤各边内臣，罢停内操[3]。但因积弊深重、矛盾丛集，崇祯皇帝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扭转局面。加上他为人刚愎自用，又猜忌多疑，对外臣皆不信任，于是在清除魏阉党羽之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仍由司礼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重开内操，直至崇祯十四年(1642)十二月二十三日，迫于形势所逼，不得已再次"谕停内操，提督忠勇营太监杨进朝所部三千人，若值大祀，仍与防护"[4]。可见他对内操宦官的依赖程度。此时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逼进北京城下，守城部队军心涣散，三大营兵皆溃降，崇祯皇帝"命内侍俱守城，哗曰：'诸文武何为！且言官罢内操，我辈兵械俱无，奈何？'或曰：'我辈月食五十万，效死固当。'"[5]崇祯皇帝最终募得数千内操宦官守城。然而就算给这批宦官装备最好的兵械也是徒劳的，内操练兵仅供表演、游戏尚可，他们平日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战斗力。农民军攻来时，他们惊惧万分，只敢放空炮，"犹伸手示贼，贼稍退乃发"[6]，左都御史李邦华欲登正阳门城楼一观守具，也被宦官阻止。明末江南昆山文人周同谷有诗曰："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诗后作者自注："授兵十万，皆净军也。十八日杜勋缒城而上，同诸珰耳语良久，麾守者退，守者争投兵濠中，勋党遂开彰义门，迎贼入城。"[7]诗作对守城宦官的人数有所夸大，但结果都是一样，十万净军对崇祯皇帝的报答竟是开门投降，这是他开设内操之初万万没有想到的。绝望中的崇祯皇帝登上万岁山，在新建成的寿皇亭自

‹1› 前揭《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页1137。

‹2› 前揭《玉镜新谭》卷五《内操》，页64。

‹3› 前揭《霜猿集》，"上即位，罢内操，军士悉归田里"。页2。

‹4› 《崇祯实录》卷一四，崇祯十四年(1642)十二月甲子，页417。

‹5› 《崇祯实录》卷一七，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乙巳，页541－542。

‹6› (清)彭孙贻：《平寇志》卷八，页1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7› 前揭《霜猿集》，页11－12。

书籍1.indb 38 12-2-7 下午1:13

缢而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寿皇亭正是他用来阅视内操之地[1]。明代宦官的内操也随着崇祯皇帝的死去而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明代宦官内操的若干特点

经过前文分析可知，武宗、神宗、熹宗三朝为明代宦官内操发展的高峰时期。除了京师危急、宦官专权等几个特定历史环境之外，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大多与皇帝的个性好恶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帝王意志的具体表现。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皇帝的喜好以及统治风格，宦官内操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而也衍生出阶段性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习武与宫廷娱乐相结合，以武宗、神宗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武宗生性好武，边军入操大内之后，武宗也开始操练宦官，其主要目的“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2]。明神宗因内操军“云锦成群，有京营所不逮者”非常高兴。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请停内操的奏疏一语道破了神宗举内操的心思，“皇上之意不过陈扈从、备军容焉则已耳，而左右近习之臣，揣知意指，遂部署队伍以进，皇上见其甲队之齐，羽旄之美，因乐此而不惓矣”[3]。

（二）战备性质的内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世宗、思宗时期。

明世宗一开始对内操并不感兴趣，内教场荒废三十余年不加修理。后来，蒙古俺答入侵，直逼都门，京营无人能战，世宗才迫改革军制，同时重开内教场，操练宦官。世宗开内操可能是受到俺答进犯的刺激，需要一支信得过的宦官武装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也起到激励京营、边军将士勤加练兵的作用。

崇祯皇帝即位后一度停止内操，在诛杀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不久，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崇祯皇帝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4]崇祯皇帝对外臣任事不力深感失望之余，又重开内操，直至崇祯十四年（1642）年底再次被迫停止，但是建制保留，如遇祭祀、谒陵之事仍与防护，但这时离明朝灭亡还不到两年了。崇祯一朝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族入侵，内忧外患不断，大厦将倾，内操已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崇祯皇帝即便让内操宦官守城，也改变不了走向灭亡的命运。

（三）权阉的私人武装，主要以熹宗时期大宦官魏忠贤主导的内操为代表。正德以来的内操总的来说都是由皇帝来主导，到明熹宗时，权阉魏忠贤反成了内操的主角。内阁大学士沈淮与之勾结，请复内操，为忠贤内镇守之基，从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魏忠贤借机大肆扩充势力，并训练了一

‹1› 前揭《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甲申之变》，页1382。

‹2› 《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60。

‹3›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九，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丁丑，页2918。

‹4›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页314。

书籍1.indb 39　12-2-7 下午1:13

支颇具威慑力的内军，正德以来的宦官内操至此已发展到极致。熹宗死后，魏忠贤曾考虑借其谋反自篡，时阉党兵部尚书临事畏缩，以时机未到而罢。

（四）宫廷政治以及财权之争，主要以神宗万历时期的内操为代表。神宗时的内操最具特殊性，除了宫廷游乐以及充任谒陵时的护军以外，还牵涉到与朝臣的对抗、宫廷财权之争。后来虽然被迫罢停内操，但君臣隔阂日渐加深，神宗借内操在宫廷财政等事项上横生枝节，与文官集团极度对立，致使朝政日益败坏。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的内操自正德年间发端以来，尽管时兴时废，但是作为“天子亲军”的内操部队却始终保留着建制，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这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后期皇帝加深了对宦官的依赖和信任。明朝宦官在外监军统兵、镇守地方，在内则提督京营、大兴内操，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至魏忠贤时掌握了一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军队，甚至一度心生异志，这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宦官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总的来看，武宗以来的内操大多只能算作皇帝的一种宫廷军事体育娱乐项目，它或许可以起到调剂枯燥的宫禁生活之用，但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便是充任皇帝外出谒陵祭祀的护军也多不胜任，更近似于一种仪仗队的性质，因而面对农民起义军时一触即溃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赵中男）

书籍1.indb 40 12-2-7 下午1:13